

爱的审判

——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

□ 潘知常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①他秉承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将这“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感受”记录下来，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这一时期的精神审判。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真正的人”。命运把他抛入 20 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他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②然而，也正因为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敏捷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念念不忘的是“还债”。在逝世前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

^①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 212 页，蓝英年等译，漓江：漓江出版社，2002 年。以下凡引此书均只注书名、页码。

^②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崇高的疾病》中的一段，转引自《三诗人书简》，里尔克等著，第 81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 年。

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①在一封书信里,他还进而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他说:“有的人非常爱我(他们为数极少),我的心有负于他们……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好像是给他们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另一封书信里他还说:“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尽了自己的努力。”诸如此类的话语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身责任的觉察。这是一种身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绝对责任,只要联想到“丧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我们就不难领悟这种绝对责任意味着什么。由此,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但是他却同时又以无限的责任感回报着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五十年前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成为“诺贝尔”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因永恒荣耀而招致终身灾难的作家,这意味着:那个世纪对于这个人欠下了巨债而且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偿还,因此,那个世纪也没有因此而被赎回。这,实在是那个世纪的遗憾,也是那个世纪的耻辱。但是,这却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遗憾与耻辱。因为,他已经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②不错,这确实是“真正的作品”。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意识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在提及几位诗人的自杀时,他也一再为“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去表达而苦闷,“写下去,过于艰难”。最终,他不惜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转而“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并“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帕斯捷尔纳克自陈说:“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③在苏联四十周

① 转引自白迟:《面对永恒矛盾的俄罗斯诗人》,http://club.heima.com/show_topic.aspx?forumid=727192&top-icid=961855。

② 转引自董晓:《日瓦戈医生》:我心目中的经典,http://www.fre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26349。

③ 转引自白迟:《面对永恒矛盾的俄罗斯诗人》,http://club.heima.com/show_topic.aspx?forumid=727192&top-icid=961855。

年庆典之际,他呈上了自己最好的纪念——《日瓦戈医生》。这是一部真正的俄罗斯的精神史、心灵史。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艺术现实”,并且“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正如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茨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所写的:“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确实如此!相比之下,我们还没有在中国的作家中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疚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最终的结果,就是20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必须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养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微的头!

二

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能不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宗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纪传人。毫无疑问,他所面临的一切都要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更为严峻、复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还只是遥不可及的一切,在帕斯捷尔纳克却都已然成为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它是人类的一次失败了的精神冒险、精神实验,也是人类的又一次俄狄浦斯式的疯狂赌博。它盛行过太多的理想,但是偏偏又使得太多的理想蒙尘。它每每以书香开卷,却偏偏又必然以血腥收场。它试图用暴力、屠杀来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与自己同床异梦的群体,因为无视自身的有限而自负、愚蠢地以为可以凭借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迅速、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消灭世界上的一切“恶”。为此,它不惜以目的的合理性来保证手段的合理性,推崇人有罪而历史无罪的梦幻,结果,不是目的证明手段,而是手段证明目的,最终从反抗转向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转向对暴力的赞扬。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付出了许多,但是却收获寥寥。想上天堂却偏偏堕入地狱。或者,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已竣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开场的是幸福的憧憬,结束的却是撒旦的诗篇。与此相应的是,个体的命运悲欢离合在群体与历史的高歌猛进当中被不屑一顾,牺牲成为理所当然。且看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的揭示:“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①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一幕?!但是,这却就是历史的真

① 《日瓦戈医生》,第593页。

实,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例如对发生在20世纪俄罗斯大地上的那场革命持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等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就没有自己的现实关怀、自己的现实判断。1937年“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他,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人场券,我不能签!”然而,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流亡海外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渴望重返祖国,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自己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一言难尽,于是,他只能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话虽含蓄,但是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难觉察。

然而,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却毕竟并非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目光远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在他看来,真正好的文学,一定要给我们一点超出现实的、政治的东西,一点只有文学才能够发现的东西,人们之所以去看文学作品,就是希望在其中看到这个东西。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文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炮轰冬宫以后怎样?事实上,革命无法拯救现实,如果革命可以拯救现实,那人类早就因为革命而获得拯救了。更何况,革命自身也还需要拯救。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悲剧既无缘无故,又无穷无尽。因为“无穷无尽”,所以它没有开始也不可能结束,因为“无缘无故”,所以它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可是革命却以为自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以为自己可以找到某种外在的原因并且通过铲除这一外在的原因而获得最终的幸福。这样,终极的关怀就被现实的关怀所替代,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借西玛之口所说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①结果,个人原罪被转换为社会原罪,人人争当激进时代的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个个要做传统时代的掘墓人。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因此而走向了拯救之拯救,走向了对于社会的精神审判。他所瞩目的,不再是历史的人,而是人的历史,不再是铁与火,而是血与泪,不再

① 《日瓦戈医生》,第479页。

是英雄交响乐,而是悲怆奏鸣曲。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发现:“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②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反抗、美学的反抗。它并不斤斤计较于“好”或“不好”,而只是去关注人性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在什么地方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人类因此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非常简单的,永远不会像生活那样让你眼花缭乱,它永远紧盯的问题就只是一个: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远?或者,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近?作家只和一个朝朝夕夕相处,那就是“人性”;文学也永远只问一种得失,那就是“人性的尊严”。雨果曾经高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就因为,在绝对正确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必须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终极关怀。这就是雨果的反思:革命是绝对正义的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的革命究竟意义何在?如果共和制度必须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为代价,那么有没有更理想的共和制度?雨果的《九三年》给我们的启示堪称深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如此,透过社会的缤纷图景,他看到的是背后的人性缺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意识到,“俄罗斯灵魂是黑咕隆冬的”,是一座地狱,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痛苦”而自铸的地狱。“恶控制了人的机体,束缚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剥夺他同降落在灵魂中的黑暗进行斗争的任何一点想法和意愿;并且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怀着复仇的激情在内心中把黑暗当做光明”^③,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并失去了重量,生存进入了零度状态,衡量人性轻重的砝码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之地,一切不断以欲望的形式呈现,一切都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值此之际,美学何为?文学何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就是走向“爱”,这无疑走出地狱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任何的社会黑暗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个人的“原罪”。这“原罪”既无可推卸也无可归罪,既无穷无尽又无缘无故,而要走出这“原罪”也不可能依赖任何的外在力量,而只能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彰显“爱”、见证“爱”。这,就是所谓“神性拯救”,也就是所谓“爱的拯救”,文学的意义则就在于为这一彰显“爱”、见证“爱”的方式作证。帕斯捷尔纳克称之为:“审判”。他借助《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④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的“审判”必然是也只能是:“爱的审判”!

① 转引自董晓:《〈日瓦戈医生〉:我心目中的经典》,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26349。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第16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③ 《日瓦戈医生》,第535页。

三

从“爱的审判”出发，帕斯捷尔纳克深刻地揭开了现实社会的隐秘一角，那就是：失爱。当历史的巨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排山倒海般到来，也曾经被人们欢欣鼓舞地完全接受。“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的日益高涨，让人们普遍认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的途径是没有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革命与暴力。^①因此，日瓦戈医生的感受是：“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②当他在雪花飘飘中买到政府第一号公告的号外时，雪模糊了他激动的眼睛，他对拉拉也说过：“革命……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每件事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是发生了转化、转变。”^③日瓦戈医生也对岳父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非正义作了判决。”拉拉也说：“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④还有“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⑤。但是，困惑很快就随之而出现。“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⑥这些人以自己独有的“恐吓手段”为武器取代了昔日的统治者，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变。1917年，日瓦戈医生从陆军医院回到莫斯科，“听说劈柴、水、照明都

① 《日瓦戈医生》，第309页。
② 同上，第225页。
③ 同上，第225页。
④ 同上，第61页。
⑤ 同上，第85页。
⑥ 同上，第228—229页。

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日常食物紧张，只能偷偷找“市郊农村的农民”买蔬菜和土豆，因为“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不是劳动人民的人”被撵出门外。“伤寒病”流行，却连抢救的车也没有，“窝窝囊囊像羊一样坐以待毙”。出门需要“出差证明”，而且动辄被强制征劳役。一半的村庄荒无人烟，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这就是“普通老百姓”过上的“好日子”。经由了一场暴风骤雨的翻身、解放，普通人在沙皇体制下遭遇的种种不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日瓦戈感叹：“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①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暴力，这一切的一切也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好。于是，人们又反过来企盼着：“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②

目睹这一切，“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③。他无法赞同游击队长利别里乌斯认为“革命与太阳系的存在同样重要”^④的看法，也发现革命、暴力的代言人们在宣扬“他们自己是一贯正确的神话，以致他们竭尽全力地无视真理”。这个独立思考者无疑不能认同这一切，因为“他不是以公认的方式，而是以同植物王国作比较的方式去设想历史”。从森林中树木和树叶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森林本身却永恒不变，他意识到，人类历史也如此，在种种暂时变化的背后蕴藏着的同样是永恒不变。革命就是暂时的变化，人性、爱、信仰才是永恒不变的。^⑤由此反观现实，日瓦戈医生意外地听到了“坐在火山口上”的声音：“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⑥

确实，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更迭都不应化约个人的价值，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更迭都应该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但日瓦戈医生面对的却恰恰与此相反：“那时革命

① 《日瓦戈医生》，第262页。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同上，第75页。
④ 同上，第397页。
⑤ 同上，参见第524—525页。
⑥ 同上，第309—310页。

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①这个僭代的伪上帝以正义与真理的名义取缔了所有人的独立思考的权利,强迫所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完全拱手相送,要“毫不可惜地彻底同独立思考分手”,行恶偏总在标榜自己是在行善,摧毁你却总是告诫你意在拯救,结果,人们的灵魂就迷失在这制度形成与更迭的泥泞中。更为令人不堪的是暴力。因为不再关注灵魂,也没有了爱与信仰,因此也就没有了与对立一方、与同盟者沟通的可能与前提,唯一的途径,就是在肉体上将其全部消灭。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而是社会动乱的先兆。社会的安定需要的是爱与生命的敬畏,而暴力的大行其道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学会爱、也还没有学会敬畏生命,更没有意识到对于暴力的宽容与放纵,实际上是犯下了蔑视爱与生命这宗更大的罪。

尤其令日瓦戈医生难堪的,是“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②。“革命癫狂”在无数普通人的心灵中诱发了新的恶。人与人彼此为敌,相互仇恨,相互伤害,人性被完全扭曲。更为深刻的是于身体的“施暴”之外,《日瓦戈医生》看到了对于心灵的“施暴”。而且,与传统的精神控制是强迫你沉默不同,现在的精神是强迫你说话,像保尔那样不断地说话(而日瓦戈医生的对策正是不说话)。结果,人不再是情感丰富、独立思考、承担责任的“真正的人”,而是棋子、燧石、螺丝钉。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尽管暴力因被涂上红色而神圣化,但是却仍旧无法掩饰其“失爱”的根本缺憾。无爱的冷漠,这“世纪的瘟疫”在隐秘而快速地蔓延。在一次被迫的战斗中,置身其中的日瓦戈医生在“敌人”身上看到的却仍旧是“人”。作为唯一的清醒者,“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③。但是,最终他仍旧没有逃脱战争的陷阱,也因为自己不得不枪杀一个少年而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我干吗要杀

① 《日瓦戈医生》,第 525 页。

② 同上,第 135 页。

③ 同上,第 392 页。

死他呢?’医生想道。”^④当“恶”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生存方式,当人心的黑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披着正义、革命的外衣公然面市,唯一的期待就不是催眠曲,而是“对人类罪性的觉醒”。日瓦戈医生的忏悔就意味着他的“对人类罪性的觉醒”(尽管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永远的流放)。确实,一个社会本来是用爱来维持的,用善来维持的,现在突然把这些爱和善连根刨掉了,成了一个没有爱、没有善的社会,结果必然是“统统化为灰烬”!

四

然而,拯救“革命”、“暴力”的目的还是为了最终拯救自己,拯救历史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最终拯救生活。借用日瓦戈医生的说法,前者可以称之为:“洞察黑暗”,后者则可以称之为:“走出黑暗”。

必须强调,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洞察黑暗”,而且,其中的多数人是从它对于政治与社会的黑暗的洞察入手,少数人则进而从它的对于心灵的黑暗的洞察起步,但是,关于“走出黑暗”则很少有人关注。尽管,事实上这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关注重点与贡献所在。显然,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疏忽与失误。当然,20 世纪的俄罗斯确实充盈着深重的劫难,而且,这劫难甚至可能超过了此前许多世纪的总和。因此,置身其中,对于这世纪劫难的觉察无疑就非常重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说,这“觉察”毕竟只是觉醒的开始,而对于世纪劫难的终结才是觉醒的归宿。其他人都是认识黑暗,但是他的可贵在于如何走出黑暗。在这方面,令人联想到的是欧洲的萨特与加缪。前者的成功在于揭露了荒诞,而后者的成功则在于如何走出荒诞,如何将萨特的终点变成他的起点,如何变萨特的只说“不”而为既说“不”也说“是”。而倘若再将《日瓦戈医生》与雨果的《九三年》作一个比较,不难发现,后者侧重的只是革命对于人类身体的暴力,而前者却侧重的是革命对于人类精神的暴力。至于将《日瓦戈医生》与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相比,我们则会发现:后者的成功在于揭露了黑暗,而前者的成功则在于如何走出黑暗,如何将奥威尔的终点变成他的起点,如何变奥威尔的只说“不”而为既说“不”也说“是”。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世纪劫难的根源不在于社会的原罪,而在于个人的原罪。要走出社会的原罪,依赖的是社会力量、外在力量的推动或者社会制度的改变,可是,要走出个人的原罪,任何的社会力量、外在力量的推动,任何社会制度

④ 《日瓦戈医生》,第 393 页。

的改变显然都无济于事,换言之,黑暗既无穷无尽,也无缘无故,这也就是说,黑暗本身根本不可战胜,然而,帕斯捷尔纳克的可贵却恰恰在于:并没有因此而走上永远与黑暗同在并且反抗黑暗的道路(这正是中国的鲁迅们所选择的道路)。因为所谓“同在”恰恰就是对于黑暗的永恒的默认。一旦你用反抗的方式来面对黑暗,其实也就证明了黑暗的不可战胜。那也就是说:你意识到了黑暗的不可战胜,而你采取的仍旧是旧世界的斗争方式即诅咒的方式、仇恨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方式。这样一来,旧世界的不可救药同时也就成为你自身的不可救药。这无疑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选择。我必须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对此的回答。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成为世纪的美学丰碑,原因也完全在此。他的选择是:与黑暗进行一场伟大的美学赌博。赌“爱”存在,赌“光明”在前。黑暗确实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坚信——光明在前。所以就完全可以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就表示了黑暗的可以战胜。换言之,一旦背对苦难,也就转而面对了光明!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寻觅到了“走出黑暗”的美学道路,这就是:爱!只有爱才是对恶的真正否定,而其他的否定,比如说以恶抗恶,比如说以暴抗暴,都不过是对恶的投降与复制。世界的丑恶不是不需要“爱”的理由,而是需要“爱”的理由。这个世界越黑暗就越需要爱,只有爱才是对恶的唯一深刻的否定。所以,真正的超越恶不是以恶抗恶,而是绝对不像恶那样存在。事实上,个人原罪并非社会原罪,任何外在的力量与革命都无法拯救,走出个人原罪唯一的途径就是爱;同样,倘若没有爱作为必要的参照,事实上罪也不成其为罪、恶也无所谓恶,因此,走出“罪”与“恶”的唯一途径也只能是爱。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与“埋葬死者的大地”相对应的“另外的某个地方”,也就是他所渴慕的“不朽的忠诚”和“个性自由”。同样,还是拉拉所憧憬的:“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①由此,正如日瓦戈医生在冥冥中所凝视并期待着的:“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确实,世界固然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却并非无药可医。人类虽然已经濒临绝望,但是却仍旧充满希望。“千疮百孔”、“濒临绝望”恰恰是对人之为人的神性的考验,也恰恰需要对于人性、爱与信仰的坚守。生命因为爱而完美,也因为爱而价

^① 《日瓦戈医生》,第148页。

值无限,更因为爱而美。也因此,爱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中,就超越了一切的一切。“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②唯有爱,才是高于一切的一切。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所呈现的,正是超越了一切的一切与高于一切的一切的爱。这样,习惯了铁马金戈洪钟大吕之类作品的读者对于这部作品或许会有许多的失望,例如日瓦戈医生就与那种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相距甚远,他毋宁是软弱、无能乃至不堪一击的。他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保尔·柯察金那类的英雄人物,而且,甚至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既不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呵护自己的情人。让你联想起的,也无非是中国的宝玉那类“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那顽石蠢物,或者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那类“多余的人”。可是,也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另外一场性命攸关的战争中,维护了在时代风云中被雨打风吹而去的爱的存在。尽管,这几乎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个人独自上阵的战争(这令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的话:“他们有那么多,而我只是一个。”),但这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战争,也是唯一真正的战争。因此,日瓦戈医生的“软弱、无能乃至不堪一击”,他的“既不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呵护自己的情人”,就恰恰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目光卓绝之处。不同于保尔·柯察金们的热衷于消灭掉自我的存在,日瓦戈医生全然是固守着自我的存在:“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为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内,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③“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半点不朽的东西。”^④同样,不同于保尔·柯察金们的以抗争而进入历史,日瓦戈医生是以亲历苦难而进入历史。要承担恶但又不被恶所吞噬,就必须找到某种承担的力量,帕斯捷尔纳克显然并不相信任何反抗的力量,看来,对于人之本性,他有着足够清醒的洞察。人根本没有能力去自我改变自己的恶的处境,因为要反抗的恶首先就存在于自己的身上,因此重要的首先就必须是:自己不去作恶,不要成为恶的祭品,而且从此去终结以“恶”来书写历史、书写人生的千年一律与千篇一律,否则,就是恶上加恶。布罗茨基说得十分精彩,与其在暴政下做牺牲品或做达官显

^① 《日瓦戈医生》,第191页。

^② 同上,第142页。

^③ 同上,第351页。

贵,毋宁在自由的状态下一无所成。这应该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心声。所以,在日瓦戈医生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到鲁迅式的“脊梁”,而偏偏看到了卡夫卡式的“懦弱”。引人瞩目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找到的也是在任何的反抗力量之外的爱的力量,所以,我们才会在身陷苦难的日瓦戈医生身上看不到丝毫怨恨的情绪,丝毫寒冷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特蕾莎修女曾经面对过一个革命者的拷问。这个革命者不理解她到处帮助穷人的行为,曾教训她说:“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的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特蕾莎修女回答说:“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我相信,这也是日瓦戈医生的回答。显然,在日瓦戈医生的“革命成分中”也“只有爱”!或者,倘若一定要冠以革命的桂冠,那么,我们就只能说,这也是一场革命——爱的革命!一场为了生命的革命而不是反对生命的革命,一场在最不高贵的历史中所完成的最为高贵的革命。也因此,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奉行的就绝非“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之类的说教,也根本不会奢望自己笔下人物的人生会“重于泰山”,而只想带着爱上路,凛然不可侵犯地穿过“革命”、“暴力”的惊涛骇浪。

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慨然宣称的“我的审判”。它所推崇的,是一种爱的圣徒的践行方式、生存方式。正如《日瓦戈医生》那著名的对白所昭示的:“去那里做什么?”“只是生活。”是的,与一切的暴力、革命相比,生活本身才是最高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存在,也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所拥有的唯一真实。所以陀氏才会说:在热爱生活的意义之前,应该首先热爱生活;加缪也才会说:在对生活的爱消失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意义能给我们以安慰。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笔下的人物则堪称对此心领神会:“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沙锅汤。”^①“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房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罗宾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②当然,这一切或许会被某些革命者斥之以“平庸”、“颓废”、“毫无远大理想与抱负”,可是,对于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而言,事实上又只有这一切才是最最重要的。

克里玛曾经评价卡夫卡的作品说:“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者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

① 《日瓦戈医生》,第338页。

② 同上,第328页。

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①这“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实际也就是“个人的最后凭借”,这无疑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力图“描绘和捍卫”的。这是不可或缺的“一张安静的床”。在革命中,生活在别处。人人被误导着进入了虚构的经验之内,“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②个人因此而缺席、人性也因此而缺席,帕斯捷尔纳克则引导人们重返人性的记忆、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生活、人性的生活因此而得以表达。换言之,帕斯捷尔纳克所做的,就是对于生活中爱的细节、爱的碎片的打捞。《日瓦戈医生》的故事实际也就是保卫生活的故事、爱的故事。日瓦戈医生说:“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象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辞藻。”“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③这些“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就是人性的记忆、个人的记忆,也是爱的细节、爱的碎片。为此,尽管“死亡确实在敲咱们的门,但所剩不多的日子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安排它们,把它们用在告别生命上”^④。“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⑤显然,这里所依依惜别的、所争取的,就是人性的记忆、个人的记忆,也是爱的细节、爱的碎片。过去看到蒂利希说艺术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有关的东西”,我有些莫名其妙,现在我才悟悟:《日瓦戈医生》为我们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些“无论如何与我有关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成功!

显而易见,这“无论如何与我有关的东西”,就是《日瓦戈医生》所渴慕的“像罗宾逊一样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像母亲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赐给自己以新生”的东西。对此,日瓦戈医生在养母安娜·伊万诺夫娜临死前说过的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可是,同一个千篇一律的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

① 转引自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第58—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② 《日瓦戈医生》,第338页。

③ 同上,第337—338页。

④ 同上,第493页。

⑤ 同上,第474页。

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您担心的是您能不能复活,而您诞生的时候已经复活了,不过没有觉察而已。”“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做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①原来,罗宾逊创造的天地与母亲赐给的新生,都并不只是平淡无奇的生活,而是意味着灵魂的获得。灵魂,这才是作为个人的生活与人性的生活所应当关注也真正值得关注的,只有它,才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它是“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也“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只有沉浸其中,才会身有所系,心有所安,神有所宁。而且,也许,暴力、革命的风暴会将自己连根拔起,也许,艰难的人生会让自己偏离这个方向,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放弃灵魂的理由。而灵魂的获得,则可以将记忆做成爱的筛子,滤去曾经的痛苦与不平,只收藏所有的美好与善良。于是,即使失败,即使不幸,但是却仍旧还是可以莞尔一笑。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我们看到,日瓦戈医生的父亲抛弃了他和整个家庭,把家族的所有财产挥霍一空,并且留下了一堆债务。可是日瓦戈医生还是愿意按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而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眼中的“没有良心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在我看来,日瓦戈医生与父亲的媾和远远超过了保尔与冬妮娅的分手,因为它是灵魂的胜利、爱的胜利。而日瓦戈医生在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遭际中却不改初衷,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到处诉苦的怨妇,没有沉溺于“为什么我如此倒霉?”、“为什么我最最不幸?”之类的泥沼,也没有将全世界都看做自己的敌人,甚至时刻提示世界“血债要用血来还”,也正是由于灵魂的禀赋。尽管,他所面对的甚至已经不是“杯水车薪”而是“滴水车薪”的努力,但是,以“滴水”去爱整个大千世界,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看来,这仍旧值得一试。为此,作者甚至夸张地提示说:这些爱的圣徒“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最后奇迹,是亚当与夏娃,他们用拥抱来彼此取暖,来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终极关怀”。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对于爱的思考与求索最为集中地在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中折射出来。这个堪称世纪经典的爱情无疑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推崇的那种爱的圣徒的践行方式、生存方式的典型写照。这是亚当与夏娃之爱,也

^① 《日瓦戈医生》,第78—79页。

是爱与爱之爱。尽管经历过革命的风暴与战争的磨难,他们已经完全无法支配自己,已经是“时间的俘虏”、“永恒的人质”,但是,作为“爱的种子”,他们却仍旧珍藏、呵护着至高无上的爱。爱是他们的共同的财富。这两个人类自由呼吸的精灵,“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他们“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那是一种“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他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①而他们的爱情则为人类“洞察黑暗”后的“走出黑暗”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份预言,那就是——“认领自己”。它意味着在疯癫的时代、在革命的旋涡中“认领”回了“自我”,重新回归“深思熟虑的心灵”,“醒来”并“独立思考”,投身“爱”与“自由”的怀抱。当然,最终他们没有在爱之中成功,而是在爱之中倒下,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并非一出悲剧,而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同样,他们的爱情也并非一种遗憾,而毋宁是一个启示或者隐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完成了什么,而在于经历了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经历,在于宁肯被毁灭也绝不被打败。因此,尽管他们的爱情并未开始于保尔式的“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如何度过”,也没有结束于保尔式的“我已经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总结陈词,而是——“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②。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爱的实践证实了,爱,值得一试,也只有爱,才值得一试。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爱,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为“人”而自豪,也才有可能为人类因此而能够与上帝平起平坐而自豪。

五

1987年,作为上个世纪第五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获奖感言中感叹:“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尽管,此时距离帕斯捷尔纳克的逝世已经二十七年,但是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其中分量的沉重。确实,这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它的遥远,只有心灵知道。不过,令人称奇的是,“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俄罗斯毕竟成功地走完了这“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而且,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帕斯捷尔纳克,也不仅仅只有一部《日瓦戈医生》。仅仅就苏联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代而言,我们就看到了帕斯

^① 《日瓦戈医生》,第577页。

^② 同上。

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与布罗茨基的身影,也看到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韵文与诗》等名著。显然,“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把一个“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苦难的地理概念成功地提升为一个“长歌当哭”的美学空间的,是一个伟大的群体。

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的更为深长的思索。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又为什么会成为《日瓦戈医生》?在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初,伴随着暴力、革命的风暴的降临,亚历山大·勃洛克曾预言: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阿赫玛托娃也曾厉声自责:“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20世纪?”他们发现,自己唯一可做的,就是为曾经产生过大师与名作的俄罗斯举行公开的葬礼。然而,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大批俄罗斯的作家,都经受住了严峻历史的考验。俄罗斯作家们立足的是一座天上的城、永恒的城。这并非一座可见的城池,而是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圣经》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这无疑正是一种获得世界的方式,俄罗斯作家所立足的,正是这样一种获得方式。就是借助于它,俄罗斯作家们才得以从信仰的高度出发去发掘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但为置身其中的社会承担着无穷无尽、无缘无故的苦难,以及最为隐秘的罪恶与不幸,而且回报以广博的爱意、温馨的怜悯、人性的抚慰。也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令整个世界莫名震撼的力量(所以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帕斯捷尔纳克则说:“作家是与上帝交谈的。”)。而我们因此在铁与火的悲剧之中也仍然能感受到“爱”所带来的血与泪的感动,对于整个世界原本已经绝望的我们身上的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被唤醒了,我们也缘此而有了继续活下去、爱下去的勇气。

毫无疑问,俄罗斯作家们的成功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获得方式。而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的成功无疑也深刻地得益于这样一种获得方式。当然,倘若把俄罗斯作家的群体比做一座金字塔,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的成功也并非由于与这座金字塔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恰恰就是奠基于这座伟大金字塔底座的塔尖。“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远?”与几乎所有的研究者的回答不同,我认为这个巨大的困惑不在于美学,而在于信仰传统。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信仰传统匮乏的民族,我们的作家与作品中有人类灵魂的声音吗?我

们的作家与作品中存在灵魂维度、灵魂深度与灵魂视角吗?我们的作家与作品中又何曾出现过俄罗斯作家与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悲天悯人的“旷野呼告”?中国的作家与作品的眼光普遍都拘泥于此岸世界与世俗世界,普遍缺乏对于绝对责任的共同承担,缺乏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欠债感”,缺乏对于文学的尊严的意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把我们的民族带出心灵黑暗的摩西。而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所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迪也就在这里。没有以信仰维度为核心的爱的获得方式,就没有新百年的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以信仰维度为核心的爱的获得方式的匮乏,就是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的昨天与今天,而以信仰维度为核心的爱的获得方式的诞生,则昭示着进入新百年后的中国美学与中国文学的诞生。

由此,美的尊严、爱的尊严、精神的尊严、信仰的尊严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整个世界也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而我们也因此而终于有可能第一次清醒地把未来还给自己,从而,得以第一次虔诚地将自己交到信仰的手中、爱的手中。

谨以此文,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发表五十周年!

2006年,难忘的3—6月 南京